

宋元谱录丛编 顾宏义 主编

范村梅谱

外十二种

〔宋〕范成大 等著
刘向培 整理校点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丛编

顾宏义 主编

村梅谱

科



「宋」范成大 等著
刘向培 整理校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范村梅谱：外十二种 / (宋)范成大等著；刘向培整理校点.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 2

(宋元谱录丛编 / 顾宏义主编)

ISBN 978 - 7 - 5458 - 1413 - 2

I . ①范… II . ①范… ②刘… III . ①腊梅科—花卉—品种
IV . ①S685. 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11922 号

责任编辑 顾 佳

技术编辑 丁 多

装帧设计 鄢书径

范村梅谱(外十二种)

[宋]范成大 等 著

刘向培 整理校点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mm 1/32

印 张 13.625

字 数 305,000

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58 - 1413 - 2/S · 2

定 价 40.00 元

总序

何谓谱录？谱录就是依照事物类别或系统编撰成的书籍。^①《释名》释“谱”云：“布也，布列其事也。”又云：“谱，緒也，主叙人世类相承，如统緒也。”《说文》云“谱，籍录也”。而录即指按门别类、依一定次序记载相关人之言行或事物的书籍。因此，中国古代最先出现的谱录，乃与家族世系的记载密切相关，如司马迁《史记·三代世表》称“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又《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西汉秘府藏书，有《帝王诸侯世谱》、《古来帝王年谱》等。因为此类谱录著作的编纂特点，故后人也开始利用谱录来记载不同类别的事物，如东汉著名经学家郑玄即通过排比《诗经》十五国风、大小雅、三颂的资料而撰成《诗谱》，用以显示其与时代政治、地域风土间的关系。于是后来就出现了单为记载经典所载物品的谱录，如三国吴陆玑撰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二卷，进而有晋代戴凯之的《竹谱》，南朝梁陶弘景的《古今刀剑录》、陈虞荔的《鼎录》等。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至此形成了一类以记物为主的书籍，专门记载某物或某一类物品的产地、形态、类别、特性、逸闻趣事及与之相关的诗文等，间附精美插图。至唐代

^① 朱积孝：《谱录述略》，载《图书馆》1995年第6期。

2 范村梅谱（外十二种）

陆羽撰成《茶经》三卷，“其书分十类，曰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四之器、五之煮、六之饮、七之事、八之出、九之略、十之图。其曰具者，皆采制之用；其曰器者，皆煎饮之用。故二者异部。其曰图者，乃谓统上九类，写以绢素张之，非别有图。其类十，其文实九也。言茶者莫精于羽，其文亦朴雅有古意。七之事所引多古书，如司马相如《凡将篇》一条三十八字，为他书所无，亦旁资考辨之一端矣”。^①由此，此类饶有趣味的图书——谱录的体裁趋于成熟定型，而影响后世甚巨。

中国古代谱录发展至宋代，各种不同类型的谱录著述纷至沓来，卷帙繁复，蔚为大观：与农事有关的如曾安止的《禾谱》、僧赞宁的《笋谱》、范成大的《桂海果志》等，与日常饮食有关的如苏轼的《东坡酒经》、窦苹的《酒谱》、王灼的《糖霜谱》等与蔡襄的《茶录》、熊蕃的《宣和北苑贡茶录》等，另有草木花卉谱如赵时庚的《金漳兰谱》、范成大的《范村菊谱》、胡元质的《牡丹谱》、陈思的《海棠谱》等，有鱼虫禽兽谱如傅肱的《蟹谱》、贾似道的《秋虫谱》、范成大的《桂海禽志》等，有文房四宝谱如苏易简的《文房四谱》、欧阳修的《砚谱》、李孝美的《墨谱法式》等，有玉石古玩谱如杜绾的《云林石谱》等，有泉币鼎彝谱如董逌的《钱谱》、洪遵的《泉志》、吕大临的《考古图》、王黼的《宣和博古图》等等。这一文化盛观的出现，与宋代文化尤其是与市民休闲娱乐文化的高度繁荣密切

^①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五《茶经》，中华书局影印本。

相关。

我国近现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在《宋代之金石学》一文中指出：“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其原因在唐、宋之际，随着阶级结构与生产关系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化，社会经济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世人对日常娱乐休闲生活的需求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促进了城市娱乐休闲文化的多元化、平民化，使得娱乐休闲文化自贵族阶层整体下移至平民社会，从而构成了宋代文化大异于前代汉、唐文化的一大显著特征。在这一社会文化背景下，宋人撰写了多种专门记录与城市休闲娱乐生活紧密相关的谱录类书籍。与前代谱录多与生产种植内容有关者不同，北宋时人撰写了数量颇众的园林花卉、文人清赏类谱录，前者如欧阳修《洛阳牡丹记》、沈立《海棠记》等，而杜绾《云林石谱》、苏易简《文房四谱》等显然属于后者。发展至南宋，更出现了与市井娱乐文化密切相关的谱录，其中著名者似当属题名贾似道所撰的《秋虫谱》（也称《促织经》）了。

宋代斗蟋蟀之风甚盛行，据《西湖老人繁胜录》载，南宋杭州人极喜养斗蟋蟀，所谓“促织盛出，都民好养”，街坊中辟有专门的蟋蟀市场，供爱好者选购：“每日早晨，多于官巷南北作市，常有三五十人火斗者。”而且由于玩者众多，所以城外农村里有专门捕捉、贩卖蟋蟀为生者，而城里也出现了专以驯养蟋蟀为职业的“闲汉”。贾似道为南宋末宰相，但也是一个著名的蟋蟀迷。据《宋史》载，当时蒙古铁骑大举围攻长江中游重

镇襄阳城，军情危急，但贾似道“日坐葛岭，起楼台亭榭”，与“博徒日至纵博”，甚至“与群妾踞地斗蟋蟀”，由此被后人戏称之为“蟋蟀宰相”。但他所撰的《秋虫谱》，分赋、形、色、养、斗、病等，对蟋蟀进行了详尽论述，可算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研究蟋蟀的专著，影响后世颇大。

撰成于南宋中晚期的《百宝总珍集》，也可算是一本奇书。《百宝总珍集》，据清代四库馆臣推测，大概为南宋都城临安城中从事古玩珍宝生意的商贾所编集，但其撰者已不可考。书中所载所记百数种珍宝玩器，每每详列其市场价格、真伪优劣、辨识手段等，并于每种器物前具载七言绝句一首，而行文多用市井口语、鉴宝行话，如卷一“青玉”条诗曰：“青玉从来分数等，滋媚润者彼人观。做造不论大与小，碾造仁相做钱看。”文云：“凡看玉亦有数等，上至不断青，下至碧绿色者，若颜色唧伶，样制、碾造、花样仁相，盏碗或腰条皮、束带、绦环零碎事件之属多着主。如绿色或夹石样范，花样不好，皆是猫货。已上数等皆是卖外路官员，此间少着主。”可见具有很高的古玩鉴定价值，也可由此一窥当时与古玩相关的各色人等以及市井口语、风俗等等。

承宋代余绪，元人所撰谱录虽然数量较少，但与宋代相比，其内容多关于器物及食谱，由此构成了元代谱录著述的一个特色。

随着谱录著述之种类、数量都较前激增，于是在宋代书目中开始设置谱录专类以收录此类文献。

宋代以前，谱录文献被附入别类之中，如《隋书·经籍志》将《竹谱》、《钱图》等归入“史部·谱系”类中，《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却将《钱谱》、《相鹤经》、《鹰经》、《相马经》、《相贝经》等归入“子部·农家”类。直至南宋中期以前，仍无专类可归，如北宋《崇文总目》将《竹谱》、《笋谱》、《茶谱》、《花木录》、《钱谱》等归入“子部·小说”类，《相鹤经》、《鹰经》等归入“子部·艺术”类；而郑樵《通志·艺文略》将谱录收入“食货”类，其“食货”类下分六小类，其中《钱谱》、《鼎录》、《刀剑录》、《锦谱》等归于“货宝”小类，《墨谱》、《砚录》、《文房四谱》与《香谱》等归于“器用”小类，《相鹤经》、《相马经》、《鹰经》、《禽经》等归于“豢养”小类，《竹谱》、《笋谱》、《荔枝谱》、《花谱》、《木谱》等归于“种艺”小类，而《茶谱》、《酒录》等则分别归于“茶”、“酒”两小类。南宋著名目录学家尤袤有鉴于此，遂在其所编撰的《遂初堂书目》“子部”之下专门设立了用来收录上述相关书籍的“谱录类”。

对于尤袤在四部分类中设置“谱录类”的原因，清代馆臣如此分析道：“古人学问各守专门，其著述具有源流，易于配隶。六朝以后，作者渐出新裁，体例多由创造，古来旧目遂不能该，附赘悬疣，往往牵强。《隋志》‘谱系’本陈族姓，而末载《竹谱》、《钱谱》、《钱图》，《唐志》‘农家’本言种植，而杂列《钱谱》、《相鹤经》、《相马经》、《鷩击录》、《相贝经》，《文献通考》亦以《香谱》入‘农家’，是皆明知其不安，而限于无

类可归，又复穷而不变，故支离颠舛，遂至于斯。惟尤袤《遂初堂书目》创立‘谱录’一门，于是别类殊名，咸归统摄。此亦变而能通矣。”所以在其编撰《四库全书总目》时，即沿用《遂初堂书目》“其例，以收诸杂书之无可系属者”。^①但因属初创，故而《遂初堂书目》“谱录类”所收录的尚还混录有《侍儿小名录》、《警年录》之类当归入“传记类”的书籍，而至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子部·谱录类”则专门收载记物之谱录，并据图书的内容，还于其下分为“器物之属”、“食谱之属”与“草木鸟兽虫鱼之属”三小类。由此，谱录当以记物为主的定义方才正式定型。

因岁月久远，宋元时期的卷帙繁盛的谱录著述多有佚失，其具体数量今日已难以考述。今日可考录的宋元谱录，大致在120种上下，其中宋代谱录约100种。这流传于世的百余种宋元谱录，大体分为三类：一是其书完整保存至今的，如宋吕大临《考古图》、洪遵《泉志》、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元李衍《竹谱》等。二是其书通过《说郛》等丛书摘要载录才得以传诸后世的，如宋常懋《宣和石谱》、田锡《曲本草》、元宋伯仁《酒小史》等，已非完篇。三是从一书中抄录一篇别出而为单行本者，如宋初陶穀《清异录》本属杂采隋唐至五代典故的笔记著作，其中“茗荈门”被后人抄出单独成书，题名《荈茗录》，成为一本屡为后世引用的茶书。南宋著名文学家范成大撰有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五《子部·谱录类序》。

《桂海虞衡志》，有志山、志金石、志香、志酒、志器、志禽、志兽、志虫鱼、志花、志果、志草木、杂志诸篇，被后人分别抄出单行题《桂海酒志》、《桂海果志》、《桂海花志》、《桂海草木志》、《桂海虫鱼志》、《桂海禽志》、《桂海兽志》、《桂海香志》、《桂海器志》等；而元代费著的《笺纸谱》、《器物谱》、《蜀锦谱》、《钱币谱》、《楮币谱》等，也本为其所著的方志《成都志》中诸篇，但为时人所珍视，而抄录别行者。对此，本从编皆视为单独著述，分别编录于各类之中。

从现存的宋元谱录情况看，其著者遍及社会各层面，其中姓名可考的，有贵为天子者（宋徽宗《大观茶论》），有官拜宰执大臣的（如苏易简、丁谓、欧阳修、周必大、贾似道等），有著名文人、书画家（如宋苏轼、米芾、洪迈、范成大、陆游，元倪瓒、杨维桢等），有隐士逸人（如林洪等），有僧侣（如释仲仁、僧贊宁等），另外有署名别号的，如题名审安老人者撰有《茶具图赞》、渔阳公撰《渔阳石谱》、鹿亭翁撰《兰易》等，或是因为此类谱录乃属“小道”，为免世人“玩物丧志”之讥而不愿题真实姓名者。但也有个别谱录的著者姓名原本失传不详，今所题姓名乃是后人在刻印书籍时所添加，其真伪于今日已不易探考，故本从编一仍其旧。

本从编所收录宋元诸谱录，大体先据其内容归入其类，同类者大体依据著者生卒年月为序编列（生卒年不详者，即以其主要活动年月为据编排）。每种谱录正文前，皆简述其撰者生平、谱录撰成年月及其主要内容、传世版本等情况；其篇末，

酌收有关序跋、题记等，以助于阅读。

本丛编所收录诸谱录，其底本一般择其精善且常见者，并酌校他本一、二种，但如其文字语义可两通者，即不予校改，而有明显舛误、脱漏、衍文者，则以圆括号“（ ）”标示其为误字、衍文，而以方括号“[]”标示其为正字、补字，但不另出校勘记。

又本丛编在编纂中，参考了不少前贤时哲的研究或校点整理成果，限于体例，未能一一标示指出，故于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顾宏义

乙未五月于海上梦湖书屋

前言

梅、兰、竹、菊，最早出现在中国传统典籍中，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的《诗经》《周易》《楚辞》，可谓源远流长。《诗》曰“终南何有？有条有梅”；“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易》曰“君子之言，其臭如兰”。《楚辞》曰“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典籍中对梅、兰、竹、菊之描写与比拟，此盖为颂赞、描写四种花木之权舆。然梅、兰、竹、菊四者明确并称，且作为“花中四君子”为世人所逐渐接受，则是始于明代黄凤池所辑的《梅兰竹菊四谱》。此谱原是作为学画范本而刊刻的，刊印后，黄氏之友明代著名文学家和书画家陈继儒在这本画谱上题签“四君”，此后梅兰竹菊“四君”的称呼即广泛传播开来。

“花中四君”在先秦典籍中早已有之，成为传统的花鸟画题材，却是在宋代发端，借力元代文人画的兴盛而发展壮大，至明清时期达到其艺术巅峰。同时，梅兰竹菊虽在明代才成为一个整体，但作为一种雅致而高洁的意象进入人们的审美视域中，被赋予独特的人格，并成为传统中国文化的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却是传统文人士大夫数千年来合力塑造的结果。

《宣和画谱·花鸟叙论》曰：“所以绘事之妙多寓兴于此，与诗人相表里焉。故花之于牡丹、芍药，禽之于鸾凤、

2 范村梅谱（外十二种）

孔翠，必使之富贵，而松、竹、梅、菊，鸥、鹭、雁、鹜，必见之幽闲。”此句言明作诗寓情于物之理，同时亦可谓传统花鸟画创作的意旨。作为或肇始或流行于宋元的题材，从“岁寒三友”发展而来的“四君子”，梅之傲雪高洁，兰之空谷幽香，竹之虚节谦逊，菊之凌霜隐逸，逐渐成为后世愈来愈多画家反复摹画、寓兴的对象，同时也成为众多诗人寄怀的良师益友。

在宋元时期，倾慕四君之姿态，歌咏四君之志向逐步成为一种风尚，其追随者之中，自然不乏痴绝者，如《画梅谱》作者释仲仁，“其方丈植梅数本，每花放时，辄移床其下，吟咏终日”。亦有如李衍“宜其爱之深，知之至。又产竹之乡，足迹所遍历，于其族类，靡不识者”。正是在这些知音的推动下，宋代及其后的元代集体出现诸多具有开创性的兰花专著《金漳兰谱》、梅花专著《范村梅谱》、菊花专著《刘氏菊谱》，以及第一部画、谱兼备的《竹谱详录》。这些谱录的出现，无疑强化了梅兰竹菊的“花中君子”形象，进一步丰富了四君子在中国文化中的表现形式。

本书收录梅谱四部：《范村梅谱》、《梅品》、《梅花喜神谱》、《画梅谱》；兰谱三部：《金漳兰谱》、《王氏兰谱》、《兰易》；竹谱两部：《竹谱详录》、《续竹谱》；菊谱四部：《刘氏菊谱》、《史氏菊谱》、《范村菊谱》、《百菊集谱》，共计十三部，以下将分梅、兰、竹、菊四部分进行介绍，以与读者共赏。

一、梅

梅原产于中国，先民植梅赏梅的历史至少已有三千年。《诗经》中写梅之句有“摽有梅，其实七兮”；“终南何有？有条有梅”。此时人们重果梅而轻花梅。其后“梅始以花闻天下”。到了汉魏六朝，艺梅、咏梅之风日渐流行，《西京杂记》记载：“汉上林苑有同心梅、紫蒂梅、丽友梅。”晋朝陆凯自荆州折早梅，托邮驿送范晔，并附诗：“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折梅赠友遂成佳话。其后从刘宋时的寿阳公主偶扮梅花妆，到传说中隋朝赵师雄于罗浮山巧遇梅花仙子；从唐代宋璟赋梅“万木僵仆，梅英载吐”，到北宋林和靖“梅妻鹤子”，梅愈来愈受追捧，品种亦日渐丰富，梅文化更是蔚然大观，至南宋，终于诞生我国乃至世界上第一部梅花专著《范村梅谱》。

《范村梅谱》又称《石湖梅谱》，以作者范成大所栽植梅花之地为范村，故名，该书成于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距今已有800余年。范氏一生以梅为题作诗170余首，并多方搜求各种梅品，最终选定了12种梅，编成《梅谱》一卷。在《梅谱》自序中，范成大毫不掩饰其对梅花的酷爱，称：

梅，天下尤物，无问智贤愚不肖，莫敢有异议。

学圃之士必先种梅，且不厌多。他花有无多少，皆不系重轻。余于石湖玉雪坡既有梅数百本，比年又于舍

南买王氏僦舍七十楹，尽拆除之，治为范村，以其地三分之一与梅。

《范村梅谱》稍后，有张镃《梅品》，亦名《玉照堂梅说》，则是通过整理出花宜称、憎嫉、荣宠、屈辱四个事类，总计58条赏梅标准，来引导观赏者正确赏梅，护卫梅花的高雅神韵。作为南宋名将张俊的曾孙、刘光世外孙，出身名门的张镃，能为梅疾呼如此，亦可见其酷爱之情。

宋伯仁《梅花喜神谱》为我国第一部专门描绘梅花情态的画谱。《画梅谱》，亦称《华光梅谱》，题华光道人撰，为墨梅画法重要理论著作。所谓墨梅，指仅用浓、淡不同的墨水自然深浅色泽而不着色，晕染成梅花图画的画梅技法，此法使中国画向写意方向发展。墨梅之法为释仲仁所始创，较之以往，将梅枝干虬曲、疏影横斜的韵致表现得更加传神。明代著名学者宋濂在《宋学士文集·题徐原甫墨梅》中说道：

唐人鲜有画梅者，至五代滕胜华始写《梅花白鹅图》。而宋赵士雷继之，又作《梅汀落雁图》，自时厥后，丘庆余、徐熙辈或俪以山茶，或杂以双禽，皆传五采，当时观者辄称为逼真。夫梅负孤高伟持之操，而乃溷之于凡禽俗卉间，可不谓之一厄也哉。所幸仲仁师起于衡之花光山，怒而扫去之，以浓墨点滴成墨花，加以枝柯，俨如疏影横斜于明月之下，摩园老人

大加赏识，既已拔梅于泥涂之辱，及逃禅老人扬补之之徒作，又以水墨涂绢出自白葩，尤觉精神雅逸，梅花至是，益飘然不群矣。

宋濂此处品评可视作唐宋时期画梅史的总结，指出释仲仁独创墨梅，一扫梅花“溷之于凡禽俗卉间”的困境，由此奠定了日后文人水墨花卉的基本风格。其《画梅谱》自然受到众多画家的追捧。

二、兰

兰，在中国栽植的历史多见于先秦典籍中。《礼记》中言“蓄兰，为沐浴也”。屈原亦有诗句“浴兰汤兮沐芳华”，“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兰花以“气清”、“色清”、“姿清”、“韵清”四清饮誉群芳，被称为花中“全德”，亦有王者香、天下第一香等美称，因其终年不凋、幽香清远而被忠而见谤的士人引以为知己。古人最初栽兰是因其香气而作沐浴用，后人们因其香气、姿态及生长特性，将其比为君子，养兰亦成为士人的一种雅趣，以致有人如赵时庚“酷爱之，殆几成癖”，并于养兰、赏兰之余，不愿“一身可得而私”，进而作《金漳兰谱》“示诸人以广传”。

《金漳兰谱》约写于1233年，作为世界上第一部兰花专著，其体例和内容对后世关于兰花之著作产生了深远影响。谱中共记载了32种兰花，叙兰之容质，品兰之高下，讲爱养之法，述

灌溉之宜，可谓赏植兼备，开兰谱创作之先河，功莫大焉。

在第一部兰谱诞生 14 年后，即淳祐七年（1247），龙江王贵学（字进叔）完成了《王氏兰谱》，所载兰花扩展到 41 种，亦详细介绍了兰花的品第、灌溉施肥的技巧、分拆栽培的方法。明代王世贞即认为“兰谱惟宋王进叔本为最善”，由此可见其广受推崇程度。

《兰易》二卷乃仿《周易》而作，上卷名《天根易》，为宋鹿亭翁著，以十二辟卦为经，附之以十二月令；下卷曰《十二翼》，题明蕈溪子辑校，以十二翼为传。本书备述出纳栽培之法，但鹿亭翁生平不详，可能为宋代隐士，也可能是后世托名，尚无定论。

三、竹

身姿颀长，疏落有致，下实上虚，中通外直，竹的姿态在传统文化中被赋予刚直不阿、谦逊虚心的君子象征。唐代白居易在《养竹记》中说：

竹似贤，何哉？竹本固，固以树德，君子见其本，则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见其性，则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体道，君子见其心，则思应用虚受者；竹节贞，贞以立志，君子见其节，则思砥砺名行、夷险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树立之为庭实焉。